

删
言
快
语



新经典出品·南海出版公司
庄妍译
【加拿大】卡罗尔·邓洛普著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著
《宇宙高速驾驶员》

驰向无限开阔

□李北园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要有个在路上。这句近乎真理的流行语，已经被反复实践。暑假期间，我身边至少有三位成功逃离日常琐碎的朋友，已经通过自驾游实现了灵魂和身体的合一。这一招不新鲜，42年前，当时声名如日中天的拉美文学巨匠胡里奥·科塔萨尔也用过。1982年，科塔萨尔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加拿大摄影师卡罗尔·邓洛普，以近乎疯狂的态度，完成了一场从巴黎到马赛的高速公路自驾游，历时32天。

说疯狂是有原因的。1982年的科塔萨尔，已经68岁。1981年8月，他突然严重胃出血，在经过艰难的抗争后，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比他小32岁的妻子邓洛普，也刚刚从一场重病中暂时缓过神来。

和疾病斗争的日子里，科塔萨尔和妻子被困于四壁之内。他用极其魔幻的语言描述两人的日常处境：“一些物品之前还是我们的朋友，却渐渐开始反抗我们最基础的日常操作：过去，冰箱一直用满意的呼噜声陪伴着我们，为我们生产冰块，现在，每次我们想听唱片时它就开咆哮。冷水龙头开始冒热水，热水龙头开始冒冷水，给我们带来阵阵尖叫和不同程度的创伤。”几乎周遭一切都面露狰狞，邪恶的楼梯台阶带着他们滑向塌陷，账单明目张胆地威胁夫妻俩，餐刀开始咬人，埋伏着的叉子也很不安分……风暴已经在房子里慢慢酝酿。

这一对连启之门之外的世界也无力掌控的病人，毅然决然对病魔，开启一场蓄谋已久的户外大冒险。这场冒险，早在1978年秋天，两人相识的次年就已经被列入计划。游戏规则如下：其一，完成巴黎到马赛的旅程，其间一次也不离开高速公路。其二，对每个站点进行探索，每日两个，务必在第二站过夜。其三，对每个站点进行科学调查，对所有的观察予以记录。其四，从伟大探险故事中获得灵感，写一本关于探险的书。《宇宙高速驾驶员》便是第四条游戏规则带来的产物。这本日志形式的书，在科塔萨尔的著作里，并没有太多文学意义上的价值，但一以贯之的悬疑、荒诞、幽默风格，是典型的科塔萨尔式，对沿途所遇的镜像式呈现，让读者得以有机会贴身细察科塔萨尔的世界。

从巴黎到马赛，有700多公里，这段只需要7小时车程的物理距离，科塔萨尔和邓洛普耗时整整32天。一路同行的，除了夫妻二人，还有一辆红色大众露营车，车上配有一个水箱和一张可以变成床的座椅，科塔萨尔另外装备了收音机、打字机、书、红酒、罐头、纸杯、灯和加热器，甚至还有泳裤。科塔萨尔称他的大众车为龙，“而且并非某条普通的龙，而是法夫纳。”在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法夫纳是一条愚蠢邪恶的巨龙，最终被英雄齐格飞杀死。科塔萨尔在法夫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将它归类于他刻意要捍卫的“那些被秩序认定为怪物、但凡有可能就会被消灭的东西”。

既然以龙为座驾，科塔萨尔和邓洛普便自名为“狼”和“小熊”，三只充满野性的“动物”开启了奇妙的高速公路行程。在一路的探险中，龟速前进的他们，渐渐与高速公路最隐秘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是星光、森林、草地和小动物组成的童话世界，带他们远离科技轰鸣的巨大噪声。

7小时的路程如何变成32天？文学、音乐、美术和历史的馈赠，还有朋友们偶尔的加盟，使得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充满了无限的弹性。从巴黎到马赛，沿途有65个站点，每到一个站点，科塔萨尔和邓洛普都伸出敏锐的触角，或者说启动雷达，捕捉与他们精神世界同频的物质世界。例如1982年6月5日，在罗西纽尔站点休息时，科塔萨尔被远处的风景吸引，他的目光沿着不知名的采石场滑行，直到“一节简短的乐曲开始在旋涡中开路”。在舒伯特的引导下，他感觉到“就像伤口意外被治愈”，“然后万物缓慢地、如此缓慢而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寻找彼此的和声，把周围的山脉甚至逐渐到来的游客都纳入其中。”随车携带的收音机，则把世界各地的消息递送给他们。5月29日，来自BBC的马岛战争消息，始令科塔萨尔十分沮丧。

这场高速大冒险，始于1982年5月23日，终于6月23日，原本计划33天的行程，由于中途行程变动，实际用了32天。冒险结束后四个多月，1982年11月2日，身患白血病的卡罗尔·邓洛普去世。当年12月，科塔萨尔将两人在旅途中的记录整理成书，并撰写后记，以此了结这场“到此结束，不过也仍在继续”的旅程。

1984年2月12日，科塔萨尔因病去世。他和邓洛普用性命进行的行为艺术，真正画上了句号。而读者的围观和模仿，才刚刚开始。



法律出版社
成寒译
【美】费慰梅著
《林徽因与梁思成》

不能移栽的植物

□陆远

1972年5月中旬，一对年逾六旬的美国夫妇应邀抵达广州，在阔别了中国25年之后开始了为期6周的访华之旅。按照计划，他们将访问广州、北京、石家庄、安阳、西安、延安和上海等大城市，革命圣地和文化古城。出乎中方意料之外，这对美国夫妇临时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希望能参观位于天津蓟州的独乐寺。尽管中方为此做了周到安排，但这对夫妻最终得偿夙愿，还是等到7年后他们再访中国时。

这对夫妻，就是整个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费正清与他的夫人费慰梅。一对美国夫妇为什么会到一座中国古庙念兹在兹？故事要回到40年前的1932年。

这一年年初，不到25岁的费正清来到北京，当时他还是牛津大学一名博士生，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历史。作为一名刚起步的学者，他带着某种“模糊的设想”来到这个东方古国。几个月后，他在北京迎娶了妻子。对年轻的美国夫妻来说，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有着与他们生长的环境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融入中国的社会和圈子还是差了些什么，直到两个月后他们认识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迷人而热情，优雅而高贵，他们都曾在美国求学，能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身上有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

这对夫妇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梁思成成为两位美国朋友起了典雅的中国名字，在此后的几年里，两对夫妻过从甚密，彼此都视对方为最好的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也曾亲自参与梁思成夫妇的古建筑寻访考察。尽管1947年以后他们再也没能见面，但彼此都维持了终身的友谊，并一直延续到下一代。

1994年，两对夫妻中唯一健在的费慰梅撰写了《林徽因与梁思成》，“不仅仅是为了追述他们那一代人的命运，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直到30年后，这本书仍是有关梁思成夫妇最好的传记作品之一。

与所有其他传记作者（包括梁思成第二任太太林洙）相比，费慰梅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通过无数次聚会、出游和交谈，她曾经深入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心灵世界。即便两家人在命运的摆布下天各一方之后，他们仍凭借书信保持了密切的精神联系。而《林徽因与梁思成》独特价值就在于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这些书信的细节，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门。

1936年，在一封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写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所谓“双重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广义上的西方文明。在20世纪中国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西文化呈现出一种既融合又冲突的复杂图景。通过这对夫妻的个案，费慰梅描摹了“五四”前后在“双重文化”浸淫与涵养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学术追求、理想信念与价值立场。

一方面，在梁林各自的精神发育史中，西方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10岁之前，梁思成一直生活在日本，12岁进入教会学校，15岁进入留美预备学校，20岁就在父亲指导下翻译名著《世界史纲》；林徽因16岁就跟随父亲常驻伦敦，为第一流的国际文化名人瞩目；订婚之后，夫妻俩在美国求学4年，取得学位后又周游了半个欧洲。他们毕生的志业，也是在欧美师友启发或者刺激下做出的选择。另一方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赤忱的爱国者，坚定地信奉民族主义，就像梁思成说的那样“尽管中国不断遭受外来的军事、文化和精神侵犯，这种（建筑）体系竟能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和长达四十年间中生存不败，这一现象，只有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样的信念不仅支撑着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中国建筑史的开拓性研究，也支撑他们在贫困和疾病的打击下苦熬过战争岁月。据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费正清夫妇曾动员梁思成夫妇迁居美国治病，梁思成的答复是：“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是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费正清不禁感慨，“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到异国的植物。”

1948年，在给费慰梅的最后一封信里，林徽因这样称赞费正清的著作《美国与中国》：“它真的全然没有外国人那种善意的误解，一厢情愿的期望或失望，我尤其欣赏费正清既能让美国读者以自己的语汇来读关于中国的事，又能让中国读者用另一种语汇来读关于自己国家的事。”今年是林徽因诞辰120周年，在这个日益全球化却也充满动荡的时代，回望历史，或许依旧可以为探索前路提供智慧。

波伏瓦美国纪行

Simone de Beauvoir
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



海南出版社
何颖怡译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波伏瓦美国纪行》

塞纳河畔升起的女性

□蒯乐昊

巴黎奥运开幕式虽然褒贬不一，但仍令人振奋地带来了许多亮点，尤其是当那十尊金色的女性雕塑从塞纳河两岸缓缓升起的时候。这一场体育的盛事，也成了呼吁性别平等的舞台。

这一切并不仅仅只是作秀，本届奥运会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男女运动员数量1:1对等。而仅在一百多年前，女性运动员还无缘世界体育运动，就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都明确拒绝女性参加奥运会，他在1912年公开表态：女性参加奥运会不切实际，无趣且不合时宜。

1920年，法国的女运动员爱丽丝·米利亚特坚持参加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遭到组委会拒绝，米利亚特一怒之下，于第二年自己组织了一届女子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自欧洲五个国家的100名女运动员参加了这场在蒙特卡洛的盛会，轰动了世界。在米利亚特等人的不懈努力和抗争下，奥运会才逐渐对女性敞开了大门。我们今天视若当然的事情，得来并不容易。

在这十尊雕像中，由于技术故障，最后一尊在升起时卡住了，这尊偏偏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一位：西蒙娜·德·波伏瓦。她的著作《第二性》至今仍被视为女性觉醒的开山之作，她详细分析了女性受压迫的起源，“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变成的”，成为此后全球性别平权运动的重要命题，这本书也一举奠定了波伏瓦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

作为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萨特的伴侣，波伏瓦和萨特曾在1955年访问过新中国。在长达45天的中国之旅中，他们参观了东北的重工业基地，见证了农村的扫盲、土改，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并把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带回了欧洲世界。法国较早地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说跟文化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也许我们可以带着同样的好奇，来读一下这本《波伏瓦美国纪行》，看看存在主义者是如何从自身的存在入手，从日常的所见所闻来感受外部世界，感受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的。这本几乎是日记体例的著作，忠实地记录了她在1947年1月25日到5月20日长达四个月的访美见闻，她的足迹涉及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从摩天大楼到尼亚加拉瀑布，从大峡谷到沙漠，波伏瓦本无全面考察美国之意，但她依然带着探索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美国贫民窟和精神病院、纸醉金迷的拉斯维加斯赌场……《波伏瓦美国纪行》是比较理性执中的中文译本，波伏瓦的原著名要犀利得多：《得过且过的美国》。——她没有在文章里下判断，却在标题里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简短的自序里，她承认：她忠实依序呈现了她此番美国行所感受到的惊讶、钦羡、愤怒、犹豫和错误，“我必须坚持：本书的任何独立章节都不代表我的最后评断，我从未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事实上，我的犹豫不决、增添补述、改错修正，集大成，就是我的意见”。

那些对波伏瓦个人生活抱有好奇的读者，也可以在这本薄薄的人游记里找到他们感兴趣的点：正是在这次美国行中，波伏瓦遇到了她的情人，小说家尼尔森·艾格林，她同样记下他们的邂逅与幽会，用缩写字母NA来代替尼尔森的名字。艾格林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被波伏瓦的美貌征服，称之为“所能见到的最美的存在主义者”。高大英俊的尼尔森也让波伏瓦感受到狂热，她亲密地称他为“我的鳄鱼”。

众所周知，波伏瓦和萨特是终生的开放式伴侣，他们尽力维护两人的亲密关系，不婚不育，同时保证各自在情感和性上的自由，前提是绝不向对方隐瞒或撒谎。萨特一生情人不断，波伏瓦在美国的艳遇也很深刻，她与艾格林保持了长时间的恋情，甚至一度论及婚嫁，直到这位美国人最终实在无法忍受要与萨特分享爱情。他们分手后，波伏瓦把他们故事详细写进了小说《艾格林读后大发雷霆》。

怎么办呢？这就是法国文化深层的浪漫自由离经叛道，遇上了美式文化深层的清教徒道德伦理。法国开幕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的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碰撞。但自由者所表达的自由里面，也应该天然包含着允许对方反对的自由。

与美国人相爱的40年后，波伏瓦去世了，她与萨特合葬在蒙巴纳斯公墓，手上却戴着艾格林曾经送她的婚戒。